

新版說明

《近代中國史綱》係著名史家郭廷以先生逝世前完成的最後一部作品。全書凡十九章，從世變之前的中西交通大勢，述至國民黨敗走台灣、中國大陸政權更迭的歷史節點。採通識寫法，略去繁瑣注釋，俾使史事一氣呵成，清晰呈現近代中國歷史的脈絡和全貌。自初刊以來，廣受歡迎，四十年間再版三次，重印十四次，早已成為中國近代史的經典著作以及研究者案頭常備的參考書。

郭先生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長，擘劃創建，筆路藍縷，更熱心拔擢後進，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奠基與推進厥功至偉。一九六九年，他辭去所長一職，遠赴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研究，期間蒐集資料，全力撰寫通史模式的中國近代史，終以四年時間完成初稿，初名《近代中國簡史》。因對政治人物與黨派的得失秉筆直書，在解嚴前的台灣難以發行完整版。經哥倫比亞大學胡昌度教授引薦，交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編輯出版。

郭先生為本書傾盡心力，初稿完成後仍釐訂年餘，彌足欽敬。然校訂未畢，不幸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因心臟病發猝然離世。逝前二日末章方定稿。此後四年，書稿以跨洋郵寄方式，陸續送呈郭夫人郭李心顏及郭正昭、芥冰峯、吳章銓等先生校閱，其間種種周折甘苦，殊難盡述。一九七九年秋，本書經四審四校編定付梓，編委會感其「考證精詳，立論平允」，遠超尋常「簡史」，蒙郭夫人允准，易名《近代中國史

綱》。原擬於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推出英譯版，惜郭先生作古後，人事幾經更迭，譯事抱憾中輟。編輯部同仁翻檢舊檔，每生嘆息。

郭先生親炙柳詒徵、羅家倫、蔣廷黻，重視史事考訂與年代學，提倡在史時與史事分明的基礎上「綜合參證」，引入「六合為一國，四海為一家」的中西交通視野，以把握近代歷史全局的脈絡系統。他的史學思想熔鑄於《近代中國史綱》之中，成就了這部他「生平最精簡最博通的傑作」（王爾敏先生語）。在他身後，新的理論與方法層出不窮，新史料的使用和傳佈日益便利，然而，郭先生遺著通過了「嚴酷的時間考驗」，始終為讀者珍愛。因此，值初版面世四十週年之際，本社鄭重推出《近代中國史綱》新版，將上下二冊合為一卷，重新錄入並校訂全書；增入郭公子郭偉闈夫人劉誕麗女士所賜舊照；特邀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發先生、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自進教授撰寫序言；延請書籍設計家何浩先生重新設計，五易方案，冀以「新的老書」之神貌，饗饋有緣讀者，並以此紀念郭廷以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二〇一九年一月

新版序一

陳永發

二〇一四年冬，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國史綱》誕生已經三十五周歲，距離郭先生殺青史稿時間更接近四十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來信，說這一本書深受讀者歡迎，是可以做中國近代史教科書的通史性著作，準備擴大發行，邀我為新版寫序。乍聽之下，我先是吃驚，隨即感到高興。英文學術界一本書籍通常只有十年不到的生命，超過十年就有作者寫「壽序」慶祝。郭先生這本書不僅活過十年，更年登「耄耋」，竟然活了將近半個世紀。這固然顯示史學界沒有盡到責任，以更好的通史性中國近代史取而代之，反而證明郭先生大作通過嚴酷的時間考驗，已成為中國近代史的經典著作。雖然我個人沒有機會親炙郭先生，但在他一手創建的近史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一輩子，而且擔任所長職務七年，對他締造這一個出版記錄，與有榮焉。對於奉命作序，更是備感榮幸。

郭先生謙稱這部長達六、七十萬字的巨作是史綱，其內容卻記述了近代歐美文明對中國的衝擊，把焦點放在十九世紀以來中國面臨三千年以來所沒有的大變局，向西方國家學習，變法改革，力圖迎頭趕上歐美的歷史，以及在求新求變歷程中遭到的限制、困難、挫折和失敗，下迄國民黨兩次革命，最後在國共競爭中被驅離歷史舞台的經過。在前後長達約四百五十年的時段裏，從高屋建瓴的全局觀點，不但強調國際關係、政治格局、戰爭經過和思想流變等各個面向，也注意社會經濟等其他方面的世變。郭先生自謙此書並非學術著作，但正因為沒有繁瑣腳

註，可讓讀者充分領略其價值。郭先生治史有兩個特色。第一個是他想要通古今之變的意圖，來自深切的愛國情懷。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北伐期間，他就憂國憂民，很想研究當時中國怎麼會淪落成為外有列強侵凌、內有軍閥蹂躪的一個國家？為什麼幾百年來志士能人那麼多，國家處境卻每況愈下？為什麼學習西方，卻始終無法改善國家命運？到底前人經世濟民和「現代化」的努力出了什麼差錯？從研究中國近代史可以得到什麼教訓？第二個特色是，郭先生雖然以這種終極關懷為治史的內在驅力，卻能擺脫極端民族主義的激情，以及反帝國主義的仇恨心理，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客觀理解國情和世變，再知人論事。因此，我們看到他發願蒐集國內有關資料和檔案，尤其大量閱讀國外文獻，再以歷史學者求真的精神，先撰寫工具書性質的史實日誌和編輯參考用的厚厚史料集，等到掌握住世變的脈絡和無數細節，方秉笔直書，既拒絕任何意識形態的操弄，復避免任何政黨派性的牢籠，所以寫出來的中國近代史，允稱信史，可為經典著作。當然在過去五十年當中，歷史學者能看到的中外有關史料越來越多，台灣大量開放官方檔案和皮藏的文獻資料，中國大陸官方也放鬆對史料的控制和散播，最近更有各種大型數位資料庫的建置，郭先生地下有知，勢必忻羨不已，然而也一定會望洋興嘆，因為活到現在，他更不可能盡讀天下有關史料。有些學者根據和參考新出史料，撰寫通史性質的中國近代史，但以之與郭先生這本巨作相比，總是感覺不足，甚至相形見绌，因而對郭先生的史學功夫和眼力，更不得不由衷欽佩。

我遲至一九八二年才在台灣讀到郭廷以先生《近代中國史綱》。在此之前，念了二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卻對郭先生的為人治學一無所知。一九六〇年代，我在台灣大學歷史系做學生，知道一個叫近史所的中央研究院機構，也知道幾位當時還是青年雋秀的學者大名，卻從來不清楚這個所的所長郭廷以先生是什麼樣的學者，為何值得深入理解和認識。我的老師吳相湘先生，在課堂上教授中國近代史，啟蒙開竅之餘，更介紹了一些前輩學者作為學習榜樣，他提到撰寫《中國近代史大綱》這本小書的蔣廷黻，甚至也提到蔣廷黻刻意培養出來的兩個好學生邵循正

和王信忠，卻從來沒有提到更早師事蔣廷黻、替蔣廷黻作研究助理的郭廷以先生。一九七〇年代，我到美國讀書，老師范力沛 (van Slyke Lyman) 和康無為 (Harold Kahn)，一是中國思想史名家李文蓀 (Joseph Levenson) 的弟子，一是美國中國近代史泰斗費正清 (John Fairbank) 的學生，都訪問過近史所，與該所年青研究人員頗有來往，但也不記得他們曾在課堂上推介過郭廷以先生的任何著作。直到一九八二年回到台灣工作，可以買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三年前出版的郭先生大作海盜版，才找來拜讀，也才發現郭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學者：該書取材宏富，敘事精準條理，文字則古樸典雅，而能擺脫國共兩黨的政治桎梏。我嘆息自己孤陋寡聞，奇怪我的老師，不論是國內自居為中國近代史學者第一人的吳相湘先生，還是國外享有盛名的美國中國近代史學者，都從來沒有推崇郭廷以先生的治學成就？我尤其好奇為什麼遲到一九七九年郭廷以先生才撰就這本足以改變史學界對他印象的史學著作？

這些疑問在我腦際盤桓，一直到我在前輩學者劉廣京、張朋園和呂實強的引薦之下，有幸順利進入近史所工作後，才逐漸得到解答。當時郭廷以先生已經去世，但聆聽他的學生回憶近史所的創所經過，後來撰寫中央研究院院史，又有機會閱讀院裏倖存的檔案，隨後也讀了他的口述歷史和失而復得由近史所出版的私人日記，才逐漸對郭廷以先生有一番理解。我想要讀郭先生的《近代中國史綱》，最好先知道一下他投身近代史研究的緣起，以及後來創辦近史所的辛酸歷程。惟有如此，才知道它為什麼在他逝世以後才能問世，也才知道它為什麼問世之後會如此成功。

郭廷以先生所以能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名家，與兩位民國名人有很大的關係。一位是五四愛國運動中喊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口號的羅家倫先生，一位是以研究早期中英關係史成名、後來學者從政的外交家蔣廷黻先生。郭廷以先生在一九二〇年代上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時，師從羅家倫先生，已有志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畢業後，隨羅家倫先生入主清華大學而擔任該校歷史教員，不久便應歷史系教授蔣廷黻的邀請，協助研究中國近代史。郭先生開始蒐集官書和當事人記載，

尤其是外國文獻，同時賡續大學時代已著手的史事日誌，不斷撰寫。不出幾年，他便將蒐集整理好的豐富史料，匯集為一帙出版，上起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東來，下迄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對華貿易的專利權為止，前後三百年，成為研究明清之際中外關係史的重要參考書籍。儘管此時他已有撰寫通史性中國近代史的壯志，但是內戰外患沓至紛來，歲月動蕩，他為了謀生，在學校教書或在政府機構任職，始終無暇於中國近代史的全面研究，遑論撰述通史性的中國近代史。

一九五〇年代，台灣海峽的局勢逐漸平穩，時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的朱家驊先生，努力恢復中央研究院的學術研究事業，他認為國民黨新敗之後，尤其需要好好研究中國近代史，為中國迎頭趕上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失敗，找出問題癥結，從中吸取歷史教訓。最初，他建議遷台後逐漸恢復舊觀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也研究中國近代史。不料該所資深學者向來認為中國近代史是非太多，塵埃未定，不可納入學術研究的領域，拒絕採納。朱家驊院長不得不另起爐灶，成立一個專門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所。他遂邀請在他擔任教育部部長任內曾任司長的郭廷以先生幫忙籌劃，郭先生認為中國近代史的領域浩瀚無邊，尤其需要成立研究基地和團隊，也慨然應允。朱院長沒有想到，他要正式向院士會議提議成立近史所時，竟然遭到杯葛。歷史語言所的院士研究員李濟諸大老，本來就認定近代史不能作學術研究，加上對與中央研究院素無學術淵源的郭廷以先生缺乏尊敬，認為他既無洋博士學位，又不能說流利英語，尤其沒有重要歷史著作，且長期在國民政府內擔任官職，遂說動胡適等其他院士連手投票反對。所幸，朱家驊百折不撓，以生米煮成熟飯的方式，強渡關山，近史所才順利誕生。

郭廷以籌備近史所，可以說是韋路藍縷，以啟山林，從一無所有做起，網羅研究團隊，興建研究大樓，大量蒐購圖書和檔案，幾乎耗盡他全部的時間與心血，雖然郭先生因此開創了台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並為之奠立不拔之基，然而犧牲了自己做學問的可以達到的高度。從籌備一開始，他慧眼獨具，在朱家驊院長的強力支持下，爭取外交部將其珍藏原始檔案交由近史所暫時保管，並進行整理和研究。郭先生研究中西

關係史，知道外交部的前身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是一八六〇年代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在列強壓力下不得不成立的一個全新機構，負責處理涉及歐美等先進國家的一切事務。在此之前，清朝自居天朝上國，視所有前來叩關的國家為蕃邦或藩屬，而將有關事務分別交由禮部和理藩院負責。在此之後，清朝承認歐美國家不是過去的蠻夷之邦，其文化有優越之處，並徹底改變交涉態度和處理方法。這個衙門遺留下來的檔案，因此可以清楚告訴我們，中國當時如何認識西方，如何與西方使節交涉，如何處理與外國商人和教士有關的洋務，如何向西方學習，有什麼成績，拘限在哪裏。郭先生認為整理和研究外交部的檔案，尤其是這批繼承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量檔案，得以彌補他當年蒐集資料之嚴重遺憾。這應該是他此時全心全力籌建近史所研究團隊的一個重要原因。當時台灣教中國近代史的老師很多，但是能做學術研究的學者似乎屈指可數，郭先生爭取他們合作，但一開始就碰到杯葛和婉拒，勉強成軍後，不免有不得其人、不得其力的感覺，他於是特別努力拉拔和訓練學生後輩，率領他們整理檔案，指點他們找尋研究題目，進行研究，並詳細修改他們的學徒時代作品。今天近史所引以為傲的早期出版品中，好幾本專書都是他字斟句酌、批改出來的。他為創造研究環境，爭取外來援助，建立圖書館，並改善同仁生活待遇。當時美國的中國研究正在費正清、韋慕廷和戴德華諸人領導下進入黃金時代，郭廷以極力爭取合作，並透過他們爭取美國基金會資助。他固然因此把近史所建設成為一流的研究機構，卻引起一些中國近代史學者和文職情治人員的誤會和猜忌，甚至惡言相加，指責他是文化漢奸或文化買辦，出賣國家檔案，逼得他不得不遠赴美國，自我放逐。我的老師吳相湘先生當時是他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難怪他跟郭先生同樣重視第一手史料的蒐集和考訂，卻從來不提郭先生領導整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的重要成就。

郭廷以先生遠離台灣，推遲了台灣史近史所開花結果的時機，但卻為他個人創造了撰寫通史性中國近代史的良機。在他去國兩年克服家庭生活問題以後，終於在一九六九年得到美國夏威夷、哈佛、哥倫比亞和香港中文大學等幾家大學的資助，繼續蒐集資料，並得以悉心全力撰寫

《近代中國史綱》一書。郭先生在近史所編輯出版大量清代官方檔案之際，同時編撰《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清季）》一大冊以及《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四巨冊。為做好這項工作，他派員調查和閱讀台灣可以看得到的官方和民間檔案和文獻，由於深知台灣當局並不鼓勵中華民國史研究，也不願意完全公開相關的檔案和史料，所以組織團隊訪問投閒置散的政治人物和過氣的軍閥將領，作口述歷史，補充和核實史事日誌原稿，也為後來撰寫《近代中國史綱》奠立基礎，厚積學殖。

郭先生在一九七五年完成《近代中國史綱》，書名與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雷同，蔣廷黻全書只有五萬多字，確類鉤玄輯要，而他史綱的字數卻是十倍以上，至少應有六、七十萬字。他在完成這一部巨作後不久，顯然因為心力交瘁而辭世，其家人將文稿送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考慮出版，不知道為什麼原因，全書問世要再拖四年。此時，中國大陸在鄧小平的領導下，終於告別毛澤東的不斷階級革命，開始重新向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打開中國大陸的門戶，但不清楚從何時開始，郭先生的大作得以進入中國大陸，並得到當地讀者的歡迎。我在近史所圖書館查了一下，發現這一本書在台灣也曾長期遭受政治干擾或封殺。台灣的南天出版社在一九八〇年取得該書台灣版權，卻為了適應政治氣氛，刪去其中關於蔣中正崛起和失敗的部分，所以原書名後面加上一九二四年為下限。遲至一九九四年台灣已經政治解嚴十年，才有另一家叫曉園的出版社出完整版。我感謝甘琦女士給我這個寫序機會，介紹這本經典史作，並簡單介紹郭先生的為人與治學精神。我也想藉機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表達一個建議，最好出版社能藉擴大發行郭先生巨作的機會，進一步考慮進行英譯，讓英語世界的讀者也能有機會分享郭廷以先生的史學成就。

新版序二

黃自進

郭先生的《近代中國史綱》，是我平生翻閱最頻繁的書籍，能為本書再版作序，自然是欣喜無比，深感榮寵。因此，「驛人獻曝」，謹此略抒個人心得，或許對讀者閱覽本書，當可提供參考。

我早年留學東瀛，主修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一九八九年學成歸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立足於日本史的基礎，以東亞的整體視野，探索近代中國史及近代中日關係史的演變，是我主要的研究工作。平日閱讀的資料，近八成是日文，如何能將日文史料轉化成典雅存真的中文，一直是我撰寫論文過程中最難克服的挑戰。

承蒙先輩同仁的推薦，我開始接觸郭先生的大作。平實簡明，是我對本書的第一印象。平實是指郭先生的敘事平易實在，簡明是指其論述精簡扼要。全書敘事之縝密，用詞之至確，除令我感嘆之外，更往往讓我罷卷深思，有如一曲聽罷，仍有餘韻繞樑之感。

例如，郭先生提及十九世紀西方勢力東來，中日兩國首當其衝，皆面臨被武力逼迫而開國之命運。然因中日兩國市場規模不一，物產資源不等，故列國圖謀中國之熾，遠超日本。針對當時中國遭遇的厄境，郭先生以「象有齒而焚其身」作評。

在談到孫中山思想時，郭先生則說其「完全得之香港」。至於孫所領導的革命運動，與康有為倡導的立憲維新的差異，其用詞為「孫中山的奮鬥係自下而上，實行革命；康係自上而下，欲得君行道」。易言之，青年時期的孫中山，眼見香港由一個廣東珠江口外的偏僻漁村，在

英國殖民之下，四十年間徹頭徹尾改頭換面，市容翻新，蓬勃發展，與廣東省城廣州的保殘守缺、遲滯不前適成對比，乃觸發仿效西法，決心投入革命事業。郭先生以香港經驗作為剖析孫人生走向的關鍵要素，用字雖簡，然意極賅；尤其，此一破題，與他稍後論述孫、康二人改革思想的本質差異時，則如枹鼓相應，令讀者印象深刻。孫的香港經驗，代表的是青年學子與現代都市文明之間的對話，亦是一部個人生活體驗史。孫以此為基點，開展自己的革命生涯，便是懷抱與普天下所有民眾共享現代文明福祉的期許。因而，孫著手革命活動之初，已從動員基層民眾著手；他眼中的典範，是法國大革命，是美國獨立戰爭。與此相較，和孫有同鄉之誼的康有為，雖也主張仿效西法，但靈感汲取自俄國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運動，以及日本明治天皇的維新圖強史。故而，康欲從事的是體制內政治改革，著眼的政治夥伴，皆是與他同屬出身科舉的權貴同僚。郭先生以「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兩句對語，闡釋孫康政治行動本質上的不同，可謂淋漓盡致。

在介紹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的中西文化觀時，郭先生用的詞彙為「西俗以橫厲無前為上德，中國以閒逸恬淡為美風，實為中西民族強弱的大原因」。蓋中西國力差距的拉大，源起於十八世紀歐洲所興起的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的萌發，又蓄積自西方的歷史傳統。西方學術界經由早年對自然界的觀測，掌握到地面物體與天體的運轉都遵循著相同的自然定律之相關知識，再利用此等科學常識而發展出利用水力和風力來代替人力、畜力的動力機器，開創了科技文明的先河。

相較於西方知識份子矢力利用大自然力量追求人類生活的便利性，中國士人仍以讀聖賢書，做古今完人為勵志標的。在中國的傳統士人社羣的既存觀念中，所謂「求知」與「為聖」是一脈相連，求知亦等同於道德修鍊，「天人合一」是大家夢寐以求的最高境界；而人與自然界的關係，是在於如何遵守自然規律，如何要求自己養成不怨天不尤人的生活態度。是故，郭先生以「橫厲無前」與「閒逸恬淡」兩句話作為中西文化在面對人世態度不一的評述，可謂洞察入微，取精用宏。

再如，郭先生認為，一九三〇年代中葉華北地區「冀察政務委員會」之所以能勉力維繫中國在華北的主權，並推遲華北緊張局勢的蔓延，是因「中國認其為中央設置之地方機構，日本視之為華北自治行政機構」。此一論述的精闢，提綱挈領地解析中日兩國在華北爭取地方勢力的博弈狀況。華北問題難解的原因是國民政府從未實質控制此一區域，一九二八年六月所宣稱的北伐成功，僅是驅逐原先控制華北區域的張作霖集團出關，易之以新加入北伐陣營的閻錫山晉綏軍、馮玉祥西北軍兩大集團分而治之。及至中原大戰爆發，蔣介石又得借重張作霖之子張學良的入關救援，方能順利擊潰閻、馮兩大軍事集團。張學良既已入關，乃又順理成章成為華北五省三市的新霸主。張學良即令因為一九三三年三月熱河的不戰淪陷，在形式上辭去軍事委員會分會代理委員長，但河北省仍在奉軍實力掌控之下。主要情勢演變在於，原本隸屬其管轄之下的晉綏及西北軍系又各自恢復獨立地位，分轄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等四省。

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五月的長城保衛戰，是中央軍系與奉系的初步聯合作戰，但也提供了中央軍進入華北的機會。一九三五年六月的《何梅協定》，則代表日本軍方欲打破中央軍與奉軍共治河北省的局面，力拱舊西北軍系的宋哲元，希望他轉變為日本軍方策動華北五省獨立運動的馬前卒。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成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便是國民政府、關東軍及宋哲元三方勢力的相互角力，各懷機心，卻又無法獨自主宰局面下的妥協產物。郭先生的解析，不僅勾勒了宋哲元治下河北省、察哈爾省享有的輕度自治，也點出了此一局面實不為國民政府及關東軍所滿意。後者的現象，為一年半後中日兩國的全面開戰，預伏先機。

評論日本投降後國共兩黨領導人的施政重點，郭先生的論述主軸是「毛所爭取的是人民的支持，蔣所重視的以軍隊為主」，一語道破兩人對戰後局勢觀測角度的不一。戰爭一結束，毛就命「解放區動員一切力量，保衛解放區，使農民普遍取得減租利益，使工人取得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利益，同時又使地主還能生活，使工商業資本家還有利可圖，並

發展生產，增加糧食和日用必需品，改善人民生活，救濟飢民、難民，發動羣眾革命熱情，供給軍隊需要」。相較於毛的深根固本，再謀天下的深算，蔣則是忙於召集各地軍事長官，舉行復員整軍會談。承平與戰時，本應就有不同的應對措施，蔣之忙於復員，代表他急於擺脫軍事主宰一切的戰時體制，以早日開展和平建國的渴望。他的這份期許，源自於國民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黨該如何儘快於戰後落實憲政體制。蓋蔣對局勢的基本認知是，將戰時體制回歸平時的法理制度，並早日兌現制憲、還政於民的承諾，就可得到民眾擁護。郭先生將蔣、毛二人戮力重點的不一，列為評述軸心，對蔣在戰後的樂觀持平、毛的嚴陣以待，刻畫了心境層次的深度洞察，可謂深獲我心。

對我而言，這本書猶如一部萬用辭典。因為郭先生的述史措辭，展現出無限張力；因此，每當我陷入文思鈍拙、語盡詞窮之際，皆得仰仗這本辭典救急。它從未曾讓我失望，永遠幫我找到可資援用的詞句。

我曾有幸在北京大學經歷一段短暫的教學機會。期間，我參觀該校校史館，印象最深的片刻，莫過於展示品強調北大教授對「黨」的忠誠。溯至一九四八年底平津政權易手前夕，蔣介石特地派遣專機赴北平，希望迎接選定的六十二位北大教授或知名學者南下。可是，在六十二位學者中，四十二位表態不願南下，赴台者只有七位。這個數字顯示，多數學者留下故里，僅有孤獨的少數人選擇了背井離鄉。因此，郭先生在世變之際，選擇來台，充分反映出他的政治立場。即使如此，他在這部書裡，對共產黨、共產主義，卻絲毫不帶成見；全書的章節名稱，更顯示他無意用「是」「非」的角度來評析國共內鬥。本書從第十六章起開始論述國共內鬥，章節的標題為「兩種內戰」。論述的重心為解析北伐結束後，國內的武鬥為何還不能止息，內戰的發展方式可用兩種不同角度來解讀。其一是當年北伐軍內鬨，蔣派與其他三派的決戰；另一就是國共兩黨之間的圍殲與反圍殲的爭鬥。

郭先生筆下的中共，是有眾多特質的政治集團。例如他特別指陳，「南京政府能戰敗閻錫山、馮玉祥等的數十萬聯合軍，對於數萬紅軍，反無如之何，窮於應付」。紅軍能戰無不勝，應歸諸「一由於政治訓練有素，官兵一體；二由於民眾組織嚴密，與紅軍通力合作」。

在往後「安內與攘外」、「八年抗日戰爭」、「中國大陸政權的改變」等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的論述中，國共優劣的比較，國民黨執政的缺失，自是郭先生論述的重點。

例如，郭先生提及抗戰後期大後方所面臨的嚴重物價問題，就明言是人謀不臧，癥結在於「工不如商，商不如囤」。政府復不給工業貸款，以為可管制通貨膨脹，結果窒息了生產。國家金融機關如中央、中國、交通及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等，「一樣以囤積為事，不但直接投資於商業組織，並自設商號、公司。掌握政治、財政、經濟的官員，亦各有企業，最為人所指目。前方部分軍人，甚而明目張膽的走私，運入非必需的商品，而以內地產物資敵，以豫、皖及浙、皖、贛交界地為甚」。

對國民黨的長年執政，郭先生總評是「北伐後國民黨內訌不休，戰亂不絕，喪失了一往淬厲奮揚的精神，虛驕自大，儼然成為統治的特權階級，遂大失人望，而以知識份子為最」。

至於延安時期中共黨國體制的建構，郭先生亦是不忘深耕，例如他提及一九四二年「整風」所蘊含的政治意義，在於「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主義以整頓文風，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習毛澤東思想，建立毛的一元領導，這可說是中共的安內」。

總之，歷史是沒有對錯，對已發生的過去，接受是唯一的選擇。研讀歷史的意義，不是在於感嘆天道不測造化弄人，而是在於了解過去，把握現在，策勵將來。郭先生是一位自由民主主義的信徒，窮一生所學就是為了想理解近代中國為何無法順利與西方文明接軌？他撰寫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用具體的史實材料為讀者再現歷史情境，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歷史的教訓。

基此思考，郭先生在本書的前半部，以西力衝擊與中國反制的角度，介紹中國的改制維新與排外，說：「甲午戰後，列強對中國的侵凌，空前兇猛，中國的反應亦隨之激烈。反應有兩種類型，動機雖均為自救，而所循途徑則大相逕庭。一為外察大勢，內求諸己，認為必須大事變革，與人並駕齊驅，結果形成政治改制運動；一為昧視時代，仍要返回中國中心之世，與外界絕緣，結果演為暴力反洋運動」。郭先生以

這種不愠不疾的態度，來檢討這一段苦難的過去，無非是想提醒讀者，歷史亦是一個民族的共業，唯有理性的面對，深沉的反省，才可能夠資格為中國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當然，從學術史的觀點來看，郭先生是所謂「南港學派」的奠基者，重視史料，專注發掘史實，並不強調理論的運用。因而，郭先生全書篇幅側重於釐清史事輪廓，點評特定歷史事件，但並未提供讀者簡潔、脈絡清晰的歷史變遷模型。這一現象，或許一部份學術工作者會感到缺憾。但此種風格，適與同時代流行的敘事黑白分明的革命史觀、唯物史觀，成為強烈對比，好處是避免淪落「以論代史」。初入堂奧的讀者驟覽書文，可能不易掌握歷史變遷的大勢，未必深刻體會郭先生的微言大義。

無論如何，本書作為郭先生史觀的最終呈現，不僅勾勒近代中國史的發展輪廓，豐富吾人的歷史背景知識，更可為歷史發展脈絡提供多元角度的省思。謹以本書伴我成長的過程，撰寫成序，與讀者分享。還望各位方家，皆樂於閱讀本書，感受一位海外游子對祖國的摯愛，並受其感召，願意各獻其力，為建構一個更真更善更美的祖國社會積累知識基礎。